

# 教師思想改造文選

(上輯)

注銷

中南人民出版社

教師思想改造文選

(上 輯)

中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漢口

書號：(中)0713

教師思想改造文選 (上輯)

---

編輯兼  
出版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建新合營印製廠  
(漢口清芬路28號)

---

1-25,000  
定價(甲2)4,000元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版

## 編者的話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國家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開幕詞）在毛主席這一英明號召之下，中南地區高等學校教師的思想改造運動基本上已經結束，並已取得偉大的勝利；中學及小學教師的思想改造，目前尚有很大的一部份沒有完成；凡未進行思想改造的教師，在今年寒假或明年暑假期間，均將進行思想改造。

參加思想改造運動的教師，都會作過自我批判。我們將高等學校教師們所作的自我批判文章編輯作爲『教師思想改造文選』上輯出版；並擬繼續編選中小學教師的自我批判文章，出版『教師思想改造文選』下輯，我們希望從事教育工作的讀者，能從其中獲得一定的啓發和教育，從而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有所幫助。

這一文選因受篇幅的限制，有些文章未能收入；在已選的文章中，有的原文很長，我們已根據每篇文章的重點或主導思想，將其比較次要的部份刪去。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

# 目錄

思想改造學習中的自我檢討	河南大學祕書長王毅齋	(一)
自我檢討	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吳于廑	(一四)
批判我所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武漢大學理學院院長高尙蔭	(二九)
我的思想檢討	武漢大學農化學系主任陳華癸	(三六)
清算我的親美崇美思想	武漢大學生物系教授鍾心煊	(四七)
批判我的反動思想	中山大學副教務長呂逸卿	(五三)
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純技術觀點	中山大學工學院電機工程系副主任顧德仁	(五九)
批判我的反動思想	中山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王起	(六六)
堅決丟掉我的名位思想	嶺南大學理工學院院長陳永齡	(七五)
檢討我的資產階級思想	南昌大學水利系主任何正森	(八三)
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	湖南大學化學系主任林兆淙	(九五)
揭露和批判我的名利思想	廣西大學經濟系教授粟寄滄	(九九)
清算我底封建思想	華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石聲淮	(一〇五)

# 思想改造學習中的自我檢討

河南大學秘書長王毅齋

## 第一部份 錯誤事實及其分析批判

### 個人英雄主義

個人英雄主義在我的思想意識中是佔着主導地位的。它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但主要的突出的我覺得有以下幾種：

首先是我『自高自大』：在思想上，過去我是抱着『雖大人則藐之』的思想的。我常誦：『彼丈夫，我丈夫，吾何畏彼哉？』『將相寧有種乎』等句。到了新社會，我這種思想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或糾正。去年隨同吳芝圃主席訪問老根據地，在杞縣講話時，有些同志就覺得我講的什麼『吳主席拿槍桿革命，我拿筆桿革命』，有自高自大的氣味，這種批評是對的。

自高自大的人必定『自以為是，好為人師』。一九四九年有幾位先生初來開封，我常到他們那裏誇誇其談，甚至自己帶着小冊子給他們朗誦，雖然有教人的樣子。內中一位先生說：『很好，明天請王先生再來講道吧。』這句話使我感到刺激與慚愧。我常聽到有人說我：在任何場合講起話來，總是使人有在說教或訓人之感。最近我的孩子在開封第一中學因曠課過多，學校勒令休學，我到該校和班主任講話，說蘇聯教師對學生怎樣負責，意在言外：你這個班主任對學生不

够負責。使他認爲我是訓教他的，引起他的反感。我之所以屢屢表現這樣狂妄幼稚的醜態，就是由於自己『自以爲是，好爲人師』，滿足於一知半解的自滿情緒使然。

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的人，又必然不能虛心接受批評。每遇到同志們給我提意見，我總是多方解釋，或加重客觀的原因，甚至於拒絕批評，惡意報復。例如：一九四九年春，我在中原大學研究小組時，有一位同志批評我，說我『基於個人英雄主義』，當時我認爲他是侮辱我，藐視我，自此敬而遠之。在參觀土改覆查時，有一位同志批評我生活特殊化，我認爲他有意與我爲難，並傷害了我的『威信』，於是我就盛氣凌人地給以反擊，犯了錯誤。其實我的生活不够艱苦，在羣衆中特殊化，都是事實。只因認爲有損自己的面子，就怒不可遏地蠻橫報復。我全沒有考慮到這一行動能有破壞團結、影響工作，對人民是很不利的後果。再者，假使有人損害了人民的利益，我是不是也怒不可遏地和他作鬥爭呢？我想是不能的。可見自己在羣衆利害面前，可以麻木不仁，對於自己的利害或生活瑣事却又敏感得很。這錯誤，不但說明了自己拒絕批評不能進步，同時也暴露了自己的偏急狹隘，不能處人。

『偏急狹隘』在我身上是很突出的，而且是一貫的。責人嚴，待己寬，能原諒自己，不能原諒別人；只覺得人家對不起自己，不覺得自己對不起人家；好指責別人小節，而自己則又不拘小節；好說別人短處，好誇自己長處，不能謙遜地和氣地待人，感情容易衝動，動輒盛氣凌人。說話尖酸刻薄，諷刺挖苦，使人難堪，失掉同情。對人對己，都無好處，且會影響團結。凡是和我接觸過的人，也都知我有這種毛病。我此刻才體會到：一個真正革命者，把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完全一致，個人與革命溶化在一起，除了革命外別無他務，惟有這種人才能有偉大的胸襟。

我最『講虛榮，愛面子』：我自幼已經種下好名的孽根。『名』在我的一生中，如同附骨之

痘。過去珍視：『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士可殺，不可辱』這幾句話，我在下意識中覺得：我是『爲名而生，爲名而死』。有一位同志說我是『名重於利』。我也覺得：『我什麼都可以犧牲，而名不能犧牲，什麼都可以不求，而名不能不求。甚至於貪。』正因爲我有自私的好名思想，所以我的行動差不多都以有利或有害我的『名』爲出發點。

因爲我好名心切，就必然要有名位計較，大事固然要計較，就是小事，也從不放鬆。例如：河大重建時，發表稽文甫先生爲副校長，我爲祕書長，我心中就起了一種波動。當時我的思想情況是：『從今以後，我居他之下了，他成婆婆，我成媳婦了。』後來選他爲本省副主席時，在候選人名單上我遲疑了好久，才在他的名字上頭圈了一個『○』。對於以上這兩件事，我都立持鎮靜，無所表示。然而在三反運動中，稽先生爲了幫助我，會親自對我說：『那時我已窺見你內心的祕密了。』現在檢討起來，自己不但慚愧，而且痛心。我一向不從工作上和人民利益上考慮問題，不檢討自己盡到職責沒有？而專門在那裏計較自己的名位，這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上爬的卑污的心理和行爲。如果能滿足自己的名位慾望，尙可以表示積極，否則，就一定鬧情緒，消極怠工。像我這幾年進步不大，不正是中了名位觀念之毒了嗎？試問人民要我這一號的人幹什麼？給我這樣優厚的政治待遇又是爲什麼？想到這裏，真是萬分痛心！

總括起來看：個人英雄主義在我身上幾乎無空不鑽，而且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階段了。它使我只知有自己，不知有羣衆；只看見個人利益，看不見羣衆利益。這樣就必然脫離羣衆，無法工作。現在我瞭解到個人英雄主義本質上就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它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也就是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的對立物。因此，爲了真正建立無產階級思想，發揚集體英雄主義，就必須首先徹底肅清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



## 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

在一九四九年夏，我初擔任河大祕書長時，主觀上要求把工作作好，作的漂亮。於是天天召集祕書室系統幾位科長祕書開會，甚至一天開兩次，更成爲笑柄的是：我盲目的亂下條子，而且條子上照例像煞有介事的批着：『火速』『萬急』字樣，其實都是些平常的事，有的同志這樣反映：『王祕書長不接近羣衆，不瞭解下邊情況，終日關在屋內。閉起眼睛，瞎下條子。』又聽總務科同志接到我的條子時說：『聖旨下』，當時我認爲這是我的『奇恥大辱』，然而在當時我還不懂得這就是官僚主義作風，因而也沒有改變。

我在民盟支部方面一開始就犯了同樣的錯誤，亂發命令，且偏於事務方面的小事，例如辦公室會議室如何佈置，各種傢具、用具如何購買。甚至指示工人同志如何擦地板、如何倒痰盂、如何打掃院落……見地板沒擦、痰盂沒倒、或幹部置買的傢具不好，就亂指責申斥。這樣一來就使得羣衆束手束腳、情緒不安。

現在我認識到，我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事務性質的命令主義作風。但是我的工作崗位——無論是在河大或是民盟——都要求我多考慮全面的重大問題。然而我卻大處不看小處看，結果使人民的教育文化事業和人民的民主革命事業都無形地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但是我爲什麼不考慮全面的重大的問題，而專注意細小末節？以前我只認爲是由於自己的工作經驗不够，沒有學會一套新的工作方法，是由於自己的理論水平政治水平都差，不會運用唯物觀的觀點和辯證的方法，於是只得應用從舊社會帶來的東西——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熱情及大半輩子養成的無休止的追求生活細節的壞習慣。現在檢討起來知道主要的原由並不在此。假使我沒有特權思想和個人英雄主義，我就能够重視羣衆，走羣衆路線，對人民負

實，從而也就可以克服或彌補以上所說的：『工作經驗不夠，政治理論水平都差……』種種缺點。『作風不是從形式上學得來的，必須在思想意識上徹底的改造』。

總之：我一貫是妄自尊大，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遇事總覺得自己應該享有特權，我可以不尊重別人，但別人不能不尊重我。總覺得自己站在羣衆之上，而不屑於站在羣衆之中，不願當人民的勤務員，而願當羣衆的『老爺』，總是迫逐自己私利，而不關心人民痛癢。總覺得自己可以爲所欲爲，遇事不喜歡和別人商量，專喜歡極端獨行。不喜歡別人命令我指揮我，專喜歡命令別人，指揮別人。像我這樣有特權思想的人，若聽其無止境地發展下去，遇着適當的機會和條件，就可能對羣衆由藐視而壓制，以至於殘民以逞。這種慘重的教訓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中不乏先例，而最近戴季英、李文甫的事件，更是我的一面鏡子。這一次在我的自我檢討中，在許多同志的大力而耐心的幫助之下，又經過自己長時期艱苦的思想鬥爭，終於把我的特權思想惡霸作風捕獲。我一定要把它看爲我的致命傷，看成我自己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所以我一定毫不猶疑地堅決予以撲滅。

## 自由主義

我在河大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之一，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主要的表現在我不尊重領導不服從領導這一錯誤事實上。

張柏園同志是本校副校長和黨委書記，學校是黨在領導，事實上也就是通過張柏園同志來領導的。而我偏無視上下級的領導關係，長期地抱着抵觸情緒。影響了團結，影響了工作，所以我承認：我的錯誤是嚴重的。茲舉幾個例子於下：

一九四九年冬我想藉祕書長職權，綠化河大，我認爲這是我職權以內的事，尤其是想藉此表

現我在工作上的偉大成績。後來聽說張副校長不同意，使我的計劃化爲泡影。這件事引起我的極大不滿與灰心，因而就常發牢騷，說：『我當祕書長連一個種樹權都沒有。』張副校長雖一再給我解釋，而我始終不能釋然。

張副校長爲了團結我幫助我進步，不時來我室講些工作方法領導藝術等問題，每次我都有所感受。但一接觸實際，我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原形，照樣出現。有一次在祕書室會議上對張副校長大發牢騷。像我這樣目無組織，譏謗領導，確實是一種極嚴重的錯誤。

我在張副校長領導下，從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年之久，我所犯的錯誤絕不止此。

由於我平日對於領導同志有那樣的抵觸情緒，所以背地我也常發『有職無權』一類的牢騷話，並且對於他也抱了一定的成見，凡是他的報告、講話、他所主持的會議，乃至對於學校的任何事情都不大重視，以至後來索性放手不管。時間久了，就引起同志和同學的驚訝與關懷。紛紛提出意見，如：『我認識王毅齋先生，不認識王祕書長』，『王祕書長究竟在學校作些啥事？』等等……這都是給我的教育與啓發。說句實話：我也明知抵觸領導、放棄責任、一日三餐、無所事事，是不對的，心中經常感覺萬分的無聊、苦悶和焦慮。

現在我把我的錯誤事實作檢討於下：

一九四九年夏我初接受河大祕書長任務以後，在主觀上我是積極負責的，但是我不會新的一套工作方法，又缺乏組織觀念，而只運用舊社會舊大學的那一套：認爲我既有職有權有責，就可以獨斷獨行，這是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那種腐朽思想和作風，而這種情形在新社會的人民大學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我們河大在黨的領導之下，有組織，有領導，有民主，有集中，因此，祕書長雖有一定的職權，但絕不能把這職權孤立起來看，而我把它孤立起來了，對上不請示報告，對下不走羣衆路線，實行民主，所以有時我覺得是辛辛苦苦積極負責，而羣衆覺得我是

高高在上，獨斷獨行。這樣，就漸漸在脫離羣衆，在團結上發生問題。

自己對於祕書長的領導工作，既不內行，而遇事又不虛心，不能採取商量態度，動輒堅持自己的意見。自己做錯了，不但不能接受批評，連校長的解釋也表示不滿（如上邊所舉的例子），認為不能貫徹自己的意見，就是『有職無權』，就表示消極、抵觸、鬧情緒、發牢騷。使得領導和幹部很爲難。張副校長始終沒有說過不讓我負責，相反地，他一再讓我負起責任來，並且常囑咐馮祕書主任說：『一切公文，必須先請祕書長批閱，否則我不看』，又說：『祕書室的重要會議，必須請祕書長主持』。由此可見抗拒領導，放棄職權，造成同志間不團結現象並給學校帶來不應有的損失，都應歸我負責。以上還只是從經過的事實來分析的，現在再進一步檢討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我覺得校長和祕書長職位都差不多，我在任何地方，黨政軍高級首長對我都都是客客氣氣的，我不是一個普通的祕書長，你當校長的對我也必須表示客氣、尊重、遷就，否則，你若以領導者自居，把我看成被領導者，一定讓我循規蹈矩地服從、就範，那我就覺得有些勉強、委屈，在這種情形之下稍有不如意，便發生抵觸情緒，形成一定成見，久之，就產生消極、牢騷、以至負氣、完全放棄職責的後果。回想起來，當初我有『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作風，後來發展到『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想法，這都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思想行爲。經我長時期的反省，深深體會到這是無恥的、可惡的作客思想、名位思想、自封功臣思想、分庭抗禮思想的綜合表現，也就是自高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的一種表現形態。

毛主席在他的『反對自由主義』著作中所指出的十一種自由主義的表現，我可以說沒一條不犯。幾年以來，我不能認真學習，求進步，不能踏踏實實地做些具體工作，『心目中沒有集體的生活原則，只有自由放任主義』與個人名位計較，以致使人民教育事業遭受損失，這回檢討起來，很沉痛地感到：對不起黨對於我的幫助和教育，對不起祖國和人民所付予我的工作任務，對

不起同志和同學。

## 教條主義

但在我的思想中成爲最突出最嚴重的問題的，是教條主義。因此，我這裏特別把它提出來，加以檢討。

我的教學態度和學習態度是分不開的，學什麼，就教什麼；怎樣學，就怎樣教。有時是現發現實。我的學習態度是教條主義式的，就是對於閱讀一本馬克思主義名著，是循章摘句，粗枝大葉，淺嘗輒止，向來不能聯繫實際，深入鑽研，以求融會貫通。至多是把書本上的一般的抽象的原理原則大致弄明白了，就算完事。我的教課態度，是事前先搜集一些有關書刊和資料，採取其中自己認爲可用的論點或結論，東拚西湊、生吞活剝，很粗糙地硬往一塊堆砌羅列。同時還好引用馬恩列斯的原文。馬克思列寧主義本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只是講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不能拿活生生的具體事實，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這樣，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了空洞的死教條。而死教條是要害死人的，因爲它使學生不能正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能很好地作實際工作，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爲人民服務。然而我反以爲「教條不壞，教條主義才是壞的」，因而就大講特講教條，以爲唯有這樣才能表示我講的東西有根據有力量，有豐富精彩的內容。我講的課是否能結合學生的思想情況，是否合乎中國革命的需要，究竟解決什麼問題？達成什麼目的？我都不管，只是機械地盲目地亂講。所以羣衆給我提的意見：「空洞無物」，「無系統，無重點」，「政治思想貧乏」，「典型的教條主義者」等等，都是十分正確的。像我這樣的人，名義上也是掛着光榮稱號的「人民教師」，實際我不鑽研業務，不認真負責，嚴重的犯着教條主義的錯誤，不能培養青年一代成爲新中國的建設人才，想到這裏，內心實在萬

分不安。我認爲我所犯的錯誤，不僅是思想方法的問題，而且是嚴重的思想意識問題。

我所以犯着嚴重的教條主義，原因甚多：（一）在思想上存着主觀主義思想方法；（二）深入實際與革命實踐不夠；（三）理論水平與政治水平不夠；（四）深入羣衆瞭解羣衆不夠，等等。除此之外，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我的思想——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一有個人主義，就專在自己的利害上考慮問題，限制我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熱情。我經常強調身體不好，腦力衰弱，喪失了教書的自信心，因而鬆懈疲塌，沒有克服教條主義完成教學任務的決心。一有個人英雄主義，就不免有一鳴驚人思想，就要自高自大，自以爲是，這樣就不會有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良好作風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而也就不能不犯教條主義。

還不止此，若再進一步追究，便可以發現我的另一嚴重的錯誤。如上邊所說：由於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表現在教學上使我只去計較個人問題（如個人健康，一鳴驚人）而不關心如何滿足學生要求，如何完成教學任務，正因爲如此，所以一遇困難（如開會忙）或挫折（如同學提意見），叫苦連天，病呀！忙呀！以掩飾自己不願意認真負責，不虛心接受批評的可卑心理。一年多以來，遇到困難，而不設法克服，遇到批評而不虛心接受，反而置學校制度學生課業於不顧，索性自行停止開課，這不是又犯了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和超階級超政治的錯誤思想了嗎？！

## 第二部份 錯誤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我於一八九五年生於住在城市內的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十歲喪母，常以『人皆有母我獨無』爲終身憾事。想藉讀書成名，報答親恩。在任何學校都拚命爭取名列前茅，爲社會人士所稱讚，因而自己更加努力與矜持。從此以後，一切作爲，一切打算，幾乎都是爲了名譽，種下了

好名的孽根。

一九一五年剛從學校走進社會，就被當時封建軍閥劉鎮嵩軍統領劉鎮華聘作家庭教師。這是我與萬惡軍閥發生社會關係的開端。一年以後辭去，在中學教幾年書，但認為教書沒有多大出息，又依陝西省長劉鎮華當職員，以便謀得一官職。誰知我在一羣老嫗敗官僚政客當中，更吃不開。悲觀失望，達於極點。終日往故紙堆中鑽，想求得些精神安慰，這就更強化了自己的封建思想意識。適逢一九二三年馬克跌價，乃請准劉鎮華帶薪赴德留學。

從我這一段歷史可以看出，我的統治思想，名位觀念，都已經有了萌芽。而頑強抵抗的性格和矜持好名的習氣，也都在這一歷史階段初步養成。

(二)我出國留學的動機，是因為那時爬不上去，幻想着到外國鍍鍍金就可飛黃騰達。同時，選定學習社會科學，是為了將來做官，發號施令，支配別人，還夢想藉此實現自己的『理想』『改造』社會。從現在看來，無疑，這是盲目崇拜歐美文化的洋奴思想，也是『勞心者治人』一類的封建意識和特權思想。在德奧多年，沒有學到一點實學，倒沾染了不少舊民主主義思想毒素，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鋪張浪費，享樂腐化等等。一九二九年回國，舊河大給我以講師名義，不就，一心想當教授，這就是我的自高自大計較名位心理的表現。但不久，劉鎮華派我作濟源縣長，而我倒馬上上任。當時自己在口頭上也標榜着什麼『三民主義』，『人民公僕』一類的話，事實上充當了軍閥的工具和幫兇，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了。幸而不到三個月，即被另一軍閥韓復榘撤職。不然的話，如果官運亨通，以後我的反動罪惡行為，不知要嚴重到什麼地步！一九三〇年充河大教授，『九一八』事變發生，在狹隘的愛國主義鼓舞之下，參加了反日救國熱潮。我受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自此始。

從我這一段歷史中不難看出：我的風頭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封建家長作風、封建統治思想



都開始打下基礎。

(三) 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從事於抗日運動，想憑個人的努力，造成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基本上仍是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的表現。一九四〇年，充經濟系主任，見當時該系的（當然不僅該系）進步學生蓬勃活躍，非常可愛，又認為自己之功居多，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一九四四年我在舊河大動員青年從軍，在客觀上幫助了反動派，而當時反以為替校方完成任務。「六二」學潮，我被僞教育部解聘。到解放區後還誇耀：『我是光榮的解聘』……從以上這一系列的事實中，可以看到：在這一歷史階段我的個人英雄主義與盲目的狂妄的自高自大已經發展到登峯造極的程度，同時自己也措上了『進步包袱』。

總之，我的一生，在解放前，沒有得到黨的領導與教育，沒有瞭解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與本質，也沒有正確的革命人生觀，只憑個人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熱，盲人瞎馬，橫衝直撞。所以除了在自己思想深處潛伏着封建統治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以外，還加在自己身上一個沉重的『進步包袱』。其實過去自己參加了抗日工作，作了一些民主運動，這都是一個國民應盡的天職，即令有其一定的進步性，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熱情的出發點，仍在達到自私的目的，同時在新社會而措『進步包袱』恰是一種固步自封，死不進步的表現。

(四) 從解放到今天已經整整四年了。在客觀條件上，我本有充分學習和徹底改造的機會，然而由於自己措着害死人的『進步』包袱加之人民給了我一定的政治地位，助長了我的自滿情緒，因而就安於現狀，停滯不前，沒有覺悟到自己有主動爭取自我改造的必要。直到這次三反運動中，才檢查出來自己的思想上作風上還存在着嚴重的問題，繼續不斷地犯着嚴重的錯誤。現在恍然如大夢初醒，真正認識到：我已達到錯誤的懸崖的邊緣了，今天就是我猛回頭的日子了！



## 第二部份 改正錯誤的辦法

經過這次我的自我檢討，我認識了我的種種嚴重的錯誤事實，認識了這些錯誤事實的思想根源，又認識了這些錯誤思想和作風對於人民和自己的危害性，最後也認識了自己已經走到錯誤懸崖的邊緣，所以我現在下了最大的決心改正我的錯誤思想與作風。茲提出改正辦法如下：

一 我首先正視我的錯誤，懺悔我的錯誤並堅決保證改正我的錯誤。我要把我的錯誤思想看成殘害我自己殘害祖國和人民的大敵人，我一定經常地和它作激烈艱苦的鬥爭，不徹底把它消滅決不停止鬥爭。另一方面，我絕不存一點和平過關的思想，更不企圖混過關去的自欺欺人的可恥心理。這是我的一個決心。

二 我盡最大的努力，放下我的『進步』包袱，甘作小學生，一切從頭學起，建立和鞏固革命人生觀，作為人民的一個忠實勤務員，劃清思想界限，腳踏實地做革命的具體工作。處理一切問題，都從人民的最大利益出發，絕不再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的又一個決心。

三 我所考慮的和應用的思想改造方法，仍不外以下三種主要的方法：（一）掌握理論的武器。（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當然還要看自己的具體條件，再進一步作具體計劃。

四 關於我所犯過的錯誤事實和存在的問題，現提出改正的保證如下：

（一）對於我的上級領導同志，我今後一定誠心誠意地尊重、服從、輔助。在工作上，我遇事和他們商量，決不再犯抵觸、消極、不團結等錯誤。

（二）對工人同志們，我一定尊重他們的人格，都看成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親切地和幫